

邓小平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派”

雷 云

提 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自称是“实事求是派”。但是从《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集》、《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等著作来看，他终其一生都是“实事求是派”。着力研究邓小平的后半生，从多次点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严于律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四个方面，论证他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派”。

关键词：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一切从实际出发 探索客观规律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作者雷云，男，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兼浙江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兼主席，研究员（杭州 310025）。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先后两次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第一次是1987年3月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的谈话：“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①另一次是同年7月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的谈话：“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②这两段话说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平息始于1986年底的所谓“学潮”后的那段时间，但是从《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集》、《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等著作来看，邓小平终其一生，都是“实事求是派”。

本文所考察的是邓小平从西南上调中央开始的后半生。按时间段来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其中每一阶段的突出事例，都能说明他是“实事求是派”。但更重要的是按精神和内涵来划分，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多次点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二是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积极探索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四是严以律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四个方面都深刻体现和反映了他是“实事求是派”。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49页。

多次点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这条思想路线，而“重申”就是“恢复”。

对于共产党来说，思想路线是决定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居于首位的路线。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说到底那时党的思想路线是对头的，而其间发生的失误，主要是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左”倾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说到底党的思想路线偏离了实事求是。惟其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全面拨乱反正，选择了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首创者、开拓者的作用。

早在1977年5月他在复出之前，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同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指出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978年5月同胡乔木等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提出要着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指出实事求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而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①同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思想僵化会导致亡党亡国；充分肯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并把实事求是提到“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的高度。此后十多年，他又反复重申这些基本观点，引导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对待新的形势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直至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再次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理论上作出的新贡献主要是：其一，把实事求是从过去通常当作一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提升到根本世界观的问题，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坚持实事求是等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其二，把解放思想纳入党的思想路线，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前提，认为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其三，深刻揭示了过去一切失误和错误的根子和开辟新时期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所在，认为离开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否定以前的“左”倾路线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可能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和全面改革开放。

邓小平之所以成为“实事求是派”，思想理论基础正在于此。他之所以既敢于批评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又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回应当时党内外对“高举旗帜”的种种迷惘和困惑，正确解决如何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最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320页。

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邓小平看来，如果说把实事求是认定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落脚点。因此，“结合”是他始终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他一以贯之的行动准则。

早在1958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我们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原则、普遍规律，但是光这样不行，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和我们自己的特点、实际结合起来。普遍规律是大同，否认大同就是修正主义；否认自己的特点和实际，就是否认小异，就是教条主义。犯修正主义错误，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犯教条主义错误，我们的事业同样会遭受失败。只有认清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实际，才能把革命搞好，才能把建设搞好。据此，他提出了“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①重要命题。1961年1月11日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要学会搞经济，并不比学会搞革命容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搞不成功的。建设也一样，必须适合自己国家的情况，也有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②十多天后的1月24日，他在会见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客人时又说：每个党只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成功。这种结合，第一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把这点放在第一位就不能胜利，就没有方向。但方针和路线不与实际相结合就没有生命，是死的。“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群众满意，二发展生产力。群众是否满意、支持是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③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空前错综复杂的新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新任务，邓小平更是极度关注搞好“结合”，反复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要求。1979年3月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4月接受卢森堡电视台采访时说：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进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1985年4月，他在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时又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这里，“或者说”表明邓小平是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实事求是看成同一个东西，又把这两者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放在同一个序列上，也就是他在1978年5月对胡乔木所说的“实事求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实际呢？最大的实际，是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8月即十三大即将召开之际，他在会见意共领导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亦即最基本国情。

①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页。

②③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5页。

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把这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现在广为流行、已成为全党全民共识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式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等等，都是在这一“总依据”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体现在实践中，尤为突出的有四件事。一是1957年1月，他在向清华大学师生作报告回答波匈事件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行不通了的问题时，指出要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以及实行制度的“方法”。我们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①。“把一个东西夸张到不适当的地位，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正因为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经验还不足，因此，我们的制度就还不是完善的。重要的是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②至于具体制度，他认为“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监督和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③这是中国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大规模建设的历史条件下，他对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的初步思考，成为他的社会主义观的基本观点，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仍然予以重申。“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则成为体现他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名言。二是1962年7月，他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对农业问题表态支持包产到户，提出“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④这就是著名的“猫论”。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最大实际是，要么让几亿农民吃饱肚子再说，要么宁肯让农民挨饿也不许分田包产以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两者必居其一。邓小平正是从这一最大实际出发选择了前者。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时期，他针对过去“左”的严重教训，多次批评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还是那么贫穷落后，体现不出它的优越性，根子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弄清楚，因此在1980年4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一论断需要有何等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宏大坚定的政治胆魄和无私无畏的理论勇气！正是在这一论断的启示和指导下，我们党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几十年来，直到今天，乃至今后一个很长历史时期，这个基本问题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的主题。四是1978年12月，他针对长期以来历史地形成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导致人民普遍贫困的实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允许部分人先富、以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在1980年代中后期，实践证明部分人确是先富了，但并没有带动后富，出现贫富悬殊现象，他对此深感忧虑，一再强调不要搞两极分化，并把这提到是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而到了1990年代初，这一现象不仅未能消解，反而愈益严重。因此他在1993年9月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⑥他根据新的实际所讲的这些话，不啻是暮鼓晨钟，振聋发

①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②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7—1018页。

④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贲，为党中央此后不断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更加注重公平，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直至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共享作为新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积极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当年在诠释实事求是的涵义时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这样，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我们从有关邓小平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正是这样做的，尤其是他以马列主义原理为指导，积极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是关于发展生产力问题。马、恩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生存的第一需要，生产力是社会全部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一切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列宁据此得出“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①、“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②的结论。邓小平坚持、继承并发挥了这些观点，早在1957年1月向清华大学师生作报告时就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好不好？这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③他在1962年提出的“猫论”，实质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变革生产关系，成为十多年后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这一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修正主义的典型而大张挞伐。但他绝不“悔改”，第三次复出后针对长期以来对阶级斗争的迷信，又发表大量言论强调这一观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他曾说过：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怎么比较？是比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是名词好听，而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要超过资本主义；等等。集中和概括起来，他作出三个重大论断：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最注重”、“基本原则”三个断语，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由此他得出的总结论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根本任务、首要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强调“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④。邓小平的一系列深刻论述，以马列主义原理为指导，毫不动摇地维护生产力标准，在“求”即“研究”人类社会进步的最一般规律。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关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人类社会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最后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但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邓小平就是根据这一规律来考察我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1958年初，毛泽东一再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布

①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③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5页。

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左”倾思潮严重泛滥起来，有些地方还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情况下，邓小平相对保持比较清醒、稳妥的态度，开始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角度思考这个问题。1961年1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的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那就要犯错误了”，“有些同志想搞共产主义，超阶段，这样做的地方都犯了错误”。^①同年7月他视察东北时又发表谈话说，“关于共产主义风格问题，今后主要讲社会主义好了。按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②。1963年5月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时又指出，“对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赫鲁晓夫看得很短，我们认为应该是很长的”，“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最终要消灭三个差别……这些差别没有消灭，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中，他反复表述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1987年十三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邓小平认为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1992年南方谈话还说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他还针对一些人因苏东剧变而产生消极悲观情绪，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三是关于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分工以后，就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商品经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它形成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资本主义是天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却不等于资本主义。但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外还对我国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严重地阻碍了改革开放。这实质上是是否承认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普遍规律的问题。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寻求其中的规律性。从1979年起他就此先后发表多次谈话，肯定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的南方谈话进而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这就把计划和市场从社会属性中剥离出来，又把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民的思想，为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二十多年来，党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定位继续探索，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改变为“决定性”，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的认识。

严以律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客观而正确地对待真理和错误，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①②③}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103、15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的根本立场。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作为和表现，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列宁在1917年说过：

“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①在1918年又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②邓小平正是这样做的。

邓小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一次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兴起，在党的高层领导和广大干部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的形势下，他总能相对保持稳妥，不看风使舵，不跟着起哄，不推波助澜。比如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尽管他是总书记，必须领导这场运动，而且还是“积极分子”，但当“右派”越划越多、运动几近失控时，他已注意到要防止扩大化，指出“对右派分子点名要慎重，不要忙于做组织结论，组织处理过早坏处很多”^③，“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④。还说：“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作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⑤“目前最危险的是把中间分子搞成右派，要警惕这一点。”^⑥比如对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一再提高指标，他说“心要热，头要冷。”“我们搞的是实事求是，更好一点，这不是泼冷水，而是压缩空气。”^⑦“现在不要把脑筋胀的大大的，这不符合实际。”^⑧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他说：“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公开向群众宣布。目前的强迫命令、虚夸、作假等不良作风，确有相当发展，要严肃认真对待。作风问题也是思想问题，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尊重客观规律。”^⑨“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⑩对于高级领导人的所谓“错误”，邓小平通常采取宽恕和包容态度，甚至为之开脱和辩解。比如：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集中批评财政部长薄一波搞新税制，高岗把他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无限上纲，大扣帽子。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⑪1958年1月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召开南宁会议，非常严厉地指责前两年周恩来、陈云等在经济建设规模上反冒进“是政治问题”。邓小平对“大跃进”虽然也采取了“跟”的态度，但不认为在毛与周、陈等之间有什么可以上升到“政治问题”高度的分歧。^⑫1958年5月至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伯承在军队工作中搞“教条主义路线”，开展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迫令其检讨。邓小平认为这是错误的、不公正的，还向毛泽东建议保留其政治局委员职务。^⑬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邓小平因腿伤没有与会，但得知会议后期批彭调子愈来愈高时说：“彭德怀同志历史上是有功的，在平江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⑭1966年3月至4月，中央工作小组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邓小平主持第一天的开幕会，就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提了三条：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准许革命。接着就离会去外地视察工作。1968年他在《我的自述》中说，自己“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⑮1966年5月，书记处成员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被打倒，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处于非常被动和窘迫的境地，但他坦承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还说：“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6页。

③④⑤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334、320页。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4、1067、1072、1103、1172、964、1058、1079—1080、1129、1328页。

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①如此等等。

邓小平对别人的错误，总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则敢于作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自我批评。他曾经说过，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这集中反映在他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多次谈话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上。首先，他一方面肯定毛泽东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同时认为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②。这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的大实话，据此就应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区分开来，把坚决纠正其错误与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其次，他指出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他还以“大跃进”为例说，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要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邓小平严于律己，敢于担当和自我批评，还更多地反映在“反右派”问题上。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有七八次讲到这个问题，基本观点一是反右本身没有错，反击和斗争是必要的；二是过火了，打击面太大了，扩大化了。1980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谈到为刘少奇平反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③。邓小平讲到“反右派”总是用“反击”或“斗争”一词，其实是一场全党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扩大化”（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称为“严重地扩大化”）的说法也未必正确，因为后来经过重新甄别，证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多的“右派”都属于错划并予以平反，岂止是“扩大化”？笔者本人也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受害者，在1958年因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正确观点（认为对资改造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被说成是“修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当了一年“右派”，十九年“摘帽右派”，历经坎坷，受尽折磨，尽管如此，还是深深感谢邓小平，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面对“举旗”还是“砍旗”的重重阻力和压力能做到这一点已是很不容易了，还能就此进行反思、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更是难能可贵的了。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可以说邓小平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派”。当然，所谓“真正”，是就总体、主流和本质而言的，并非百分之百。邓小平是一代伟人，又是普通的人，是人而不是神，不可能事事皆正确，句句是真理。现在回头去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检讨和“永不翻案”的表态并不真诚出于内心，新时期多次讲到“反右派”时只提“反击”或“斗争”而回避“运动”并留一个“必要”和“正确”的尾巴，对高饶（特别是饶漱石）事件的评述与近年来新披露的实情有所出入，他在1979年3月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已消灭了剥削条件、在1988年5月说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等论点也未必准确。既然是人不是神，看问题、说话、下结论就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和认识的种种局限。我们不能离开当年特定条件用今天的事实和认识去苛求于前人。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责任编辑：凌 雁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传（1904-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77页。